

散乱的历史

——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

余章宝

米歇尔·福柯(1926—1984年)是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代表。他对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社会科学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福柯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成为他对历史学方面独到的贡献。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对新历史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德森说福柯“创建一种新的历史方法”,韦纳称福柯为“纯粹的历史学家”,德勒兹评价更高,认为福柯是“一种哲学研究方式的开创者,这种研究方式本身是全新的,同时也复兴了历史学”。

他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中。从时间上看,考古学方法是他前期主要论题,主要代表作是他的考古学三部曲:《诊所的诞生:医学知觉考古学》(1963年)、《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年)和《知识考古学》(1969年)。1970年前后,他从考古学方法转向了谱系学方法。主要著作有《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年)和《性经验史》(1976年)

谱系学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并不是两种相对立的方法,而是一致和互补的,可以说谱系学是对考古学的深化。“谱系学术语是指关于博学的知识和局部的记忆的统一,它为了建立一种斗争的历史知识和现在仍然对这些知识进行利用的策略”。实质就是用无序的、片断的计划对统一的、形式化的科学话语进行反抗。考古学则“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两者关系可以概

尽管福柯本人对人们给他贴上“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标签的反应是十分义愤,但他本人的义愤并不能影响他的文本逻辑。关于这一点可参见: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8, p. 208。

R J 安德森:《后结构主义》,载《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转引自刘北成:《福柯史学思想简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ed. Colin Gordo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0 p. 83。

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括为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批判在其合目的性上是谱系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如果说考古学是对话语实践的研究的话,那么谱系学则是对非话语实践研究,把话语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揭示话语中的权力机制。两者的目标一致,都是唤醒冷僻的知识和局部记忆以废除总体性话语,在撕开理性面目,取消历史客观性,取缔那个连贯的理性的意识主体,放弃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立场,远离总体化倾向的元叙述等方面都是考古学和谱系学共同所关心的课题。

一、颠覆历史理性

现代性肇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它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恩格斯对现代性特征有过一段经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识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时代总是被冠以“理性时代”的标记,现代性就是理性另一种说法。从此,这股理性主义观念弥漫了整个欧洲社会思想之中。在历史学领域中也例外,理性主义由此登上了西方历史学观念的王位。无论作为历史哲学奠基者维柯、“百科全书派”人物,还是为启蒙运动辩护的康德、黑格尔,他们都服膺历史理性,即把理性作为历史隐蔽的“元力量”。

后现代主义实质上就是对现代性即启蒙理性的怀疑。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对理性的出生和家世进行了考察和揭露。理性话语霸权的产生是通过这样几个途径实现的:

第一,否定与分类。理性通过排斥、拒绝、禁闭、阻碍、隐藏等非理性方式给理性与非理性划界,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在《疯癫与文明》著作中,福柯通过对疯癫现象进行考古学研究,揭示了西方独特的文化向度:理性/疯癫关系。在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上,疯癫属于一种未分化的体验,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的。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还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在17世纪两件事件引起了重要变化:“一种是1657年法国总医院(又可译‘总收容院’)建立,对穷人实行‘大禁闭’;另一个是1794年解放比塞特尔收容院的带镣囚禁者”。这两件相反的事件“导致了中世纪和人文主义的疯癫体验转变为我们今天的疯癫体验,即把精神错乱完全归结为精神疾病”。从此,疯癫开始进入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文艺复兴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而是被变得虚假可笑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知识中保持了这种沉默,有的只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出居高临下的博爱和理性代表的看守人对他们的照顾。理性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否定性的机制成功地

福柯著,顾嘉琛译:《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页。

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福柯:《疯癫与文明》,第4页。

实现了对非理性的控制。

第二,监禁与惩戒。理性一方面通过各种监禁机器渗透到微观权力中,甚至侵入到我们的肉体,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力,从而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本瑟姆的“圆形监狱”就是一架设计得非常精致的监禁机器。从监狱、兵营、工厂、学校以致于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机器运转之中,从而形成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的、庞大的监禁机制;另一方面理性诉诸于话语的实践创造法律,因为法律事实上是通过话语陈述的。法律、法规通过理性的“论证性”为非理性制定各种“秩序”,形成公共权利的合法化、话语和组织。惩戒就是这种合法性不可缺少的附属物,同时借助合法性把惩戒规范化、公共化。

第三,审查与禁忌。审查机制实质上是“把层级监视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理性话语构想出一套逻辑联系,并用它作为剪裁他者的尺度,并贯穿于这种检查机制之中。凡是符合这种逻辑的就是正常的、理性的;反之则被排斥为反常的,非理性的。禁忌通常有3种形式:其一是肯定非理性不允许发生,其二是防止人们谈论它,其三是否认它的存在。其特征是,“它把不存在的、不合法的、不能表达的3样东西用一种互为因果方式联系起来。被禁止的东西只有从现实中消失才能谈论它;不存在的东西没有权力显露自己,甚至在声明它不存在的讲话里也不行,人们必须保持缄默的东西作为首要的禁忌之物被排斥于现实之外”。正是这种审查与禁忌机制使非理性被牢牢地囚禁在黑暗和秘密之中。

从理性的业绩来看,据说,理性可以为人类带来解放、进步。可是举目环顾,历史理性当初的许诺现今给我们所兑现的仅仅是:世界大战、集中营、种族灭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广岛原子弹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等。人们不能不对自笛卡尔以来建立的理性力学有效性进行全面的检讨。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立场基本一致,福柯也是把现代理性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当人们运用理性对自然和物进行征服和控制的同时,也就把这种控制形式应用到社会各个角落,因为“对物的控制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进行的”。这样,人类一切行为都被整合到理性的话语之中,理性的规范无孔不入地进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无所不在。在现代社会以前,社会对人的控制是一种高成本权力,而现代性发明了理性的规训(纪律)是以最小的代价使控制得到最广泛的实施的权力技术。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权力经济学,其原则是既增加受奴役的力量,又提高奴役者的力量和效率”。启蒙以来,惩罚的理性化,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高尚人道主义动机,而是基于惩罚的经济和深入。它决“不是要惩罚少些,而是要惩罚得更有效些,或许应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08页。

福柯著,余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61页。

参见:Bruce A Arrigo, Christopher R Williams, “Chaos Theory and the Social Control Thesis: A Post-foucauldian Analysis of Mental Illness and Involuntary Civil Confinement”, *Social Justice*, San Francisco, Spring 1999, Volume 26, p. 198.

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页。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33页。

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人并没有从一次次战争中逐渐进步,达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

据称,理性把求真精神作为自身的目的,是为了求真而求真,它是价值中立的和客观的。福柯则反对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知识常表示自己与权力无关,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冒充公允)。“他承接尼采的传统,把真理看成由权力制造出来的一种武器”,一贯关心的问题是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即不是把真理当做谬误的对立面,而是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它们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都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首先来看看科学,“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试验这类抑制性的设施”。再看人文科学的构成就会发现,它并不是通过理性的进步来逐步实现的。“人文科学的话语……一方面是对支持统治权的权利的重新组织,另一方面则是以监禁形式来实施的强制性的势力。……权力是通过这一权利和这些技术同时实现的,而监禁带来的这些话术和技术侵占了权利的领域,使规范化的程序更经常地从事于对这些法律的归化”。

理性是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权力)结果。没有一般的、自由的、中性的、独立的、不受权力影响的(power-free)话语。正如古典时代神学和权力相互支持一样,现代的真理和权力互为表里。理性不仅是社会特权的一个掩饰而且还是社会特权的确证。人们之所以这样热衷于追求真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求真本身,而是为了追求权力,因为真理具有权力的效果,求真意志其实是权力意志的变种。除了权力以外,“有关真实的历史,这还是一块处女地”。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真理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仅仅是通过各种控制形式被生产出来的”。历史上,理性曾猛烈抨击过教会和神权的独断性和权威,这种独断性和权威就是一种非理性,可是理性转而成为它曾攻击过的那种形式的非理性,理性声称自己垄断着真理,成为历史的主宰,是治理、控制、决定、解放人类的主人。它把自己体制化,借助于权力既为自己制造合法化外衣,又以这种合法性身份来压制、排斥非权威、非中心、非主流的话语,宣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91页。

福柯著:《语言、反记忆、实践》,康纳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页,转引自余碧平:《译者序》,载福柯著,余碧平译:《性经验史》,第4页。

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8, p. 120

参见:Richard A. Lynch, “Is Power all There Is?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Power Relations”, *Philosophy Today*, Celina; Spring 1998; Volume 42, p. 68。

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32页。

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32页。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ed. Colin Gordo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0, p. 131.

判它们是“谬误”、“非理性”和“非法”。可见理性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一种新的非理性和独断性。

理性并不是什么纯粹、干净、高尚的东西,它有一个充满偶然、热情、断层、裂缝、脆弱、怯懦、专断、残忍、暴力、仇恨、嫉妒、异质、混乱、卑微、邪恶的祖先。原来启蒙崇拜的那个理性的光荣经,无非就是一定的规则建构起来的一套话语。这套话语是由各种力量交汇、组合而成的,是为某些利益而服务的,在所谓理性的伪装下面是权力。它的产生正是靠一整套极端专横的、独断的、非理性方法和相关的社会建制配件组装起来的消音机器,用以平息话语的巨大嘈杂声。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诞生的那段著名的说法就是,理性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从头到脚每个血管里面都是流淌着它所排斥的那个非理性的肮脏的血。

二、放逐历史主体

主体和理性都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并且两者又是孪生兄弟。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理性的个体取代了上帝。现代概念——无论是科学的(外在实在、理论、因果性、科学观察),还是政治的(权利政治学,民主代表,解放和自由)、历史的——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消灭主体同时也就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可以说,主体“成了对现代性进行总批判的一个工具”。福柯以现代性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他继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宣布了“人之死亡”。

先验的主体死亡是《词与物》的重要主题。先验的理性主体只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它诞生于现代知识型内部,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起而产生的。“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16、17、18世纪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在此期间人根本没有任何位置”。由于古典知识型的表象模式的衰落,人们对表象本身质疑、探究,表象本身成为知识客体,于是人才成为现代科学的对象,人和人文科学才会诞生。

随着20世纪初,各种新科学特别是反人文科学如精神分析、语言学和人种学相继产生,使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了。特别是尼采的谱系学方法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型出现。尼采说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精神分析研究人的无意识领域,关注人的欲望。语言学研究否定了语言是表象的产物和媒介,关注的不是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给的结构。人种学是研究文化的历史,它关注于社会的无意识结构。这样,笛卡尔所宣称的“我思故我在”的认识主体地位被架空了,主体与其说是认识和被认识的“阿基米点”,不如说是欲望、语言和无意识的产物,

参见波林·罗斯诺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8页。

波林·罗斯诺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62页。

福柯著,马利红译:《人死了吗?》,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福柯:《人死了吗?》,载《福柯集》,第80页。

因此,“人”也就随之终结。简言之,“人的出现是知识的基本排列中的变化的产物。考古学能轻易地说明,人是最近的发明,并且人正在面临消亡”,“人的形象正如人们在沙滩上留下的画像,它也会被海水抹去”。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运用谱系学具体地揭示主体的真实形象。主体构成是权力通过一整套规范和程序塑造出来的。这种“造就”主体的规范包括作息时间表、训练、隔离、监视、测验、分类、挑选、等级、奖励和惩罚等等措施,制造出“两个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学校、医院、工厂、军队和监狱一样,它们都是一部权力规训机器,整个社会就是一座“监狱之城”,它通过规训(对身体和精神作用)制造出温驯的和有用的主体来。

现代社会发明的规训这套惩罚机制是如此高效、精妙,它把人的肉体 and 灵魂全都纳入了它的权力技术学之中。在这部权力机器中,肉体也不是一种给定的、超历史的纯粹生物学范畴,“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成为一种可驯服、可安排的玩偶,以实现成为可利用力量即劳动力,肉体实际上是“政治肉体”(body politic)。现代社会对人的灵魂和思想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封建社会,“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在现代社会中聪明的政治家,“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那种在现代获得的尊贵的主体地位实质上是由权力导演和驯化出来的,人既是权力规训的对象,又是发挥权力作用的工具,是权力关系的效果。对于谱系学来说,主体是一种多余的假设。所谓“谱系学,即能够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事物之构成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无需参照某个主体,不管这个主体超越了事件场,还是顶着空洞的自体贯穿于历史”。

传统历史认为,历史学家的理性有能力说明过去。他们肩负着教育、启迪读者,向读者解释、灌输历史垂训,从而起着传承文化的作用。福柯则要取消历史学家这种优先接近真理的优越地位和特权。为此,“福柯考察了作者的谱系并且认定在原始人中间不存在作者。原始叙述是唯一地以口头传诵和集体复合为特征的。福柯把著书立说设想成现代资产阶级试图为控制或管理作品而确定责任的一个虚构过程。没有作者的话,那么当有麻烦的文本出现时,惩罚如何实施,或者法律责任该如何归属呢?”可见,作者(包括历史学家)只是一个现代的虚构、发明或话语建构,充其量不过是借助现代知识型框架中的分析假定,目的是为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3, p. 405.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p. 387.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33页。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7页。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30页。

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13页。

福柯著,蒋梓骅译:《米歇尔·福柯访谈录》,载《福柯集》,第447页。

波林·罗斯诺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第39—40页。

了寻求规定、限制、控制和追究责任而已,所以,现代作者是一种实施和运载权力的工具,对作者关注意味着蕴含所有权和一种特殊的身分。

福柯坚决拒绝历史叙述需要通过某一主体为权威来阐释历史真理和意义的做法。就历史文本形成来看,历史文本一方面是话语际之间的相遇建构起来的,即在特定的认识型中,许多人不断地填充、增殖、参照、质疑、批评、评价等话语游戏建构成的特殊空间。说不好听,福柯实际上就是在说包括历史文本在内的天下文章都是一大抄,是许多文本碎片拼凑成的大杂烩。文本间不断产生新的文本,根本不存在独创性作者。历史叙述不存在独创与平凡的差别,不承认历史学家的话语具有独创性,而一般人则是平庸者,是对前者的模仿。特定知识型中的话语空间规定了历史学家们看、思的方式。历史文本并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传递的,而是制作它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话语系统的产物。因而历史学家只是起着编织文本作用。其材料和编织方式都是由话语际建立起来的先验知识给予的。这令笔者想起被人们早已淡忘的马克思所说的话:“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時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另一方面,由于原先被认为的客观和中立的主体,暴露在谱系学之下的是权力的真相,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受到权力的影响,如接受某机构支持,而这些机构实际上就确立并控制着著书立说活动的环境,所以一个历史文本的构造不仅受话语实践的制约,同时它也受非话语实践特别是权力的影响。

无论是话语实践还是非话语实践作用都排除了历史主体,所以历史主体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可以缺席、隐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针对这种功能-主体展开分析,他把陈述主体归为“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也就是说,主体只是话语的功能或建构材料以及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福柯淡化作者的角色,否认作者的权威,取消历史家解释的优先权,从而作为经验的主体——历史文本的作者在后现代世界里也就随之死亡。

三、瓦解历史客观性

历史客观性是现代史学一个核心的观念,它是建立在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先验地假定存在着某种实在或过去是真实的或有效的,那个主体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主体,一方面只有通过它才能再现、复制、反映、代表、摹写、表现它;另一方面这个先验的主体又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建构成一个历史的实在。因此,要反对这种客观性必然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主体再现客体合法性 3 个相关的问题。

首先,历史实在论所假定的那个“人”或“主体”本身是成问题的。前文已经指出,在福柯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

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第119页。

看来,历史客观性所要求的那个统一的、融贯的、连续的、理性的主体根本不存在或可以不存在。主体只是特定的权力规训的产物,是话语的功能。福柯消解了主体,也就破坏了历史客观性。

其次,历史实在论假定了一个未受话语影响或中介过的历史实在和历史本来面目。可是那个真实的有效的客体或历史实在恰恰不先于话语而存在,其本身就是话语的产物。话语与对象(客体)之间关系根本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成为话语对象(客体)的事物本身是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对象(客体)本身;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对象(客体)都有对应的“物”。如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的。因此,“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

不存在客观有效的过去,也不存在判断谁说的是真实的,谁的推理更严谨,谁最符合历史。只存在话语际或文本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福柯称之为“话语的实证性”即“标志着这个话语历经时间沧桑并超越个人的作品,书籍和文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不同话语或文本之间在一定范围内,一些形式上的连贯、某些主题上的循环、某些概念的位移、某些论战的游戏传递等。实证性是在话语际各种交流游戏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各处流传的书籍,所有这类属于相同的话语形成的文本,——许多作者,他们彼此认识或不认识,相互批评、贬低、抄袭,而又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聚首,他们固执地将他们各自独特的话语交叉在不属于他们的,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清它的整体并且难以测量它的广度的网络中”。这种实证性就是历史的先验的知识,就是这种先验的知识成了历史。但它决不充当判断某种历史叙述是否有效、合法或客观的标准,而只是人们能够陈述历史的条件。所谓历史的真实性至多只能在这种已经说出来的先验的知识范围内才有意义。考古学所发掘的都是些散乱的文本,无法从这些碎片中复原成完整的历史文本,“考古学的过去会带来多种景观,相同的碎片可以讲述许多故事”。我们“无论是在思想、经验或是外部世界以外都不可能获得一幅完整的、客观的和独立的画面”。不存在有待我们去再现的历史实在或历史本来面目,这些文本只标志着某种话语实践的规则。同时,“这种先验的知识脱离不了历史性,因为它不能在事件之上并在静止的天空中构成超越时间的结构”,“它本身还是一个可转换的整体”。

既然不存在一个给定的过去或历史实在,那么历史认识就不是去精确地再现某一客体或历史本来面目,而只是一种解释,并且是不完全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讲故事。所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59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61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62—163页。

Agnes Hell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8, p. 39.

R J 安德森:《后结构主义》,载《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64页。

以,历史的客观性本身是一个虚构的问题,“真与假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原则的界限,历史文本和小说一样。关于这一点,德勒兹有过这样的评述:“在某种意义上,福柯可以宣称他除了故事什么也不曾写过”。他本人这样说的,“关于虚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特别重要,我只知道除了虚构以外,我并没有写过任何其他东西,因而真实是不在场的。这意味着虚构有可能起着真理作用,虚构的话语可以产生真实的效果,真实的话语可以产生或‘制造’并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虚构’。我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并使之成为真实”。这样,传统的真实的历史被他取消,准确地说,传统的单一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被拆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由于这种历史不再承担再现给定的过去,因此它就是一种文学、小说或故事(his-tories),是不再具有特权的局部叙述而已。

最后,表象或再现(representation)观念是传统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依据它,人们才津津乐道地大谈客观地再现历史实在和与客观实在相符合。在福柯看来,表象本身就要依赖于自我意义的主体存在和客体的有效性这样一些假定。由于主体和客体都受到怀疑,主体被消解成了散乱的、不连续的碎片,客体被看成是话语建构的对象,所以,表象也是不可靠的。同时,表象要通过话语表达,可是话语本身是历史建构起来的现实,这样,在能指和所指之外不存在某个客观的历史实在可供再现或表象。实际上,表象是古典知识型的基本标志,在古典知识型内部,表象才是清晰的、可靠的、有效的、直接的。“表象是一个普遍的、中立的、自觉的和‘客观的’思想模式”。由于对表象功能的质疑,表象观的衰落才产生了现代知识型。在现代知识型中,表象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绝对的、自我验证的出发点,表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思想,表象本身是有待解释的问题,即对表象本身成为知识的客体,人成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表象就成了次要的和派生的东西,从此“表象逐渐变得昏暗不清了”。在现代知识型中,表象就已经成问题,不用说后现代了,所以,福柯眼中的后现代世界当然是一个不具有真正表象的世界。

福柯还从谱系学角度揭示人类历史认识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真相。历史实在论主张要设法消除认识者的主观立场,使认识保持“中立”,从而保证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在谱系学眼中,这种价值中立的元立场根本不存在,它纯粹是一种凭空捏造的谎言和幻觉。谱系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坦然成为一种透视性知识,即暴露他们的观察位置、他们所处的时刻、他们无可抗拒的热情的东西,承认自己不公平的手法。所谓客观的历史知识仅仅是从某一视角(perspective)观察的产物。视角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对历史的认识就有多种多样的,并不存在单一的解释,每一个解释都可以激发其他视角不断地解释历史,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也不存在特许的或优先的视角来充当上帝的眼睛。正因为不存在这种上帝的元立场,所

R J 安德森:《后结构主义》,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6期。

德勒兹著,谢强译:《一位新型档案员——论知识考古学》,载《福柯集》,第558页。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ed. Colin Gordo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0 p193

Alan Sheridan, *Micha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Tavistock Publications (New York), 1980, p82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3 p310

参见福柯著,王简译:《尼采、谱系学、历史》,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以,历史学家能够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过去的承诺是无法得到兑现的。

福柯和解释学一道埋葬传统的历史实在论的观点,都把客观知识看作一种解释,都否定了存在着能够判断不同解释的客观性标准的那个给定的过去。伽达默尔把过去看成是经过存在的历史性过滤过(解释)的。福柯则认为那个所谓自然的、直接的、即刻给予的过去实际上是由阐释性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同时,他也反对解释学把客观性引向所谓深层结构的观念,否认存在显话语和隐话语的二元划分,反对存在着一种解释具有特许性或优先性。认为“不存在终极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仅仅是起着一种权力关系的作用”。

福柯确实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个幻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否认了真实的历史,他反对的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对客观性的理解。真实的历史就是感性的历史。实际上,“人类不过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我们除了历史以外一无所有”,而我们自己永远只能从现有的知识型来认识历史,而知识型本身也是历史的,它没有本质,没有永恒性,也没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观看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只是“一些‘真实性的游戏’,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程序,真实性与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离”,“实践、过程和方法构成真实的程序,构成‘一部真实性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只能与产生它的程序相联系才能理解,不存在超越这种程序真实性。我们不能一般地谈论历史客观性问题,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域内部谈论它才有意义;同时,客观性不仅是话语实践内部的一个事件,它还与权力机制这样非话语实践相联系。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谈论历史客观性,也并不是为了重建那个过去,其“目的是为了向当代权力和知识体系挑战”。

四、终止历史进步

现代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维度上逐渐累积式进步,它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倒退的、停滞的观念,树立起乐观主义。现代理性主义历史观本质上是“以远大目标和高尚道德为基本特征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普遍主义的、向善的、进步的幸福主义或千年福主义。这种理性乐观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历史进步与理性、连续性、主体等问题是密切相联系的,福柯对它的解构也是在理性、连续性和主体3个战场同时进行的。

前面已经指出,福柯对理性进行谱系学研究,揭示了理性的非理性真相,同时也就抖落

参见 Mark Bevir, "Objectivity in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Vol 33, p. 328.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Press 1983, p. 106.

R J 安德森:《后结构主义》,载《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德勒兹著,谢强译:《沉淀,或历史的形成:可见物与可陈述物(知识)》,载《福柯集》,第575页。

德勒兹:《沉淀,或历史的形成:可见物与可陈述物(知识)》,载《福柯集》,第576页。

Mark Bevir, B, "Objectivity in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Vol 33, p. 328.

Hilton Kramer, "Postmoder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1980's." *The New Criterion*, 1 September 1982, p. 42

出现代历史把理性作为历史高尚目标的虚幻性。

只有历史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累积的过程,历史发展才能被理解。历史的连续性是保护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堡垒,所以福柯对历史连续性本身作了搅乱以达到拒绝进步的历史观目的。考古学方法的一项任务就是“分解由历史学家的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因而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是一种“用幻灯取代电影,用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的电子综合法。

福柯在《词与物》著作中考察了西方现代思想史由不同的知识型(*épistémè*)特征的间断的历史组成。也就是说,就这个现代性本身这样的中长时段来看,也不是现代历史通常所认为的线性连续过程,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三个时期两次断裂形成的。所谓知识型是一个由无意识的分类范畴产生的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因素所组成的知觉结构。埃里蓬是这样归纳的:“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福柯给这一‘历史的先验知识’冠以知识型之名,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

文艺复兴知识型大致上是指16世纪,其特征是依据相似性(*resemblance*)原则来构建知识。人们不自觉地在此事物与事物之间、词与词之间以及词与物之间寻求相似性,相似性成为组织词与物合法性基础,人们眼中的世界是经过相似性安排好秩序的世界。在相似性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型中,作为能指的符号(词)和由符号指向的所指(物)处于混然一体中。语言不是独立的符号整体,它“只是起着或隐或暗的标记作用”。语言与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词与物相同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语言类似物,是世界的一部分。由于口语是转瞬即逝的,不能很好地代表物,而书写语言则与物之间关系更为紧密,所以“书写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占支配地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破译这些符号,而不是像镜子一样反映世界,故语言主要功能在于注释、评注、解释。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巫术、神话之间并不作出区分。

古典知识型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由于培根和笛卡尔等人对相似性原则发起了攻击,西方思想史发生了断裂,相似性知识型分崩离析了。塞万提斯塑造的唐·吉柯德形象标志着文艺复兴知识型的终结。唐·吉柯德还是运用相似性来认识事物,而新的时代则根据同一与差异原则来看世界,所以他被看成是滑稽可笑的。古典知识型特征则是表象(*representation*)。所谓表象就是词与物之间是一种摹本与原型、再现与实在、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关系。语言属于一个独立的本体论领域,词与物相分离,由于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由自然形成的相似性来建立,而是通过表象来确立,这样原来词与物之间固定的联系就松开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18页。

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第188页。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p. 34.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p. 38.

参见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3, p. 46 ~ 50.

了。词与物之间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灵活,甚至作为词的符号与物可以是一种约定关系。如贝克莱与休谟等都把观念看成是世界的记号。古典知识型就是用分析取代了解释,同一与差别原则取代了相似性原则,确实性知识代替了或然性知识,神话、巫术与科学开始分离。也就是“对从(相似性)的感觉变为对抽象复杂的观念的全部表象形式作一般的分析”。

18世纪末,西方知识基础又发生了深刻变化,表象逐渐式微,最后知识型再次断裂,于是现代知识型产生。福柯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实际上就是质疑了表象,认为只有一些经验形式才是表象的,而反思则是探索表象客体的力量的起源和基础,而这个基础在表象之外。他对表象划定了界限(经验),超过这个界限(先验)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现代知识型既不同于文艺复兴知识型用对照(相似性)来组织经验世界,也不同于古典知识型运用分析(事物同一与差异)来表象经验世界,而是认为世界并非由因同一与差别在图表中排列和联系起来的,即不是事物的外在的“特征”而是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组成的。由于各要素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它们执行着总体的功能。这种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类推性,故实在才能相互联系。这种有机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类推性关联把时间性因素引进来,这样现代知识型强调了持续性或历时性。在现代认识型中,作为能指的语言失去了原来的透明性,从而表象不能承担联系各种因素的基础,语言的意义不必求助于它曾表象的那个所指,它的意义在语法体系作用中就能获得。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型中,人才真正诞生。

这3种知识型之间不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后一个知识型并不是从前面“演变”而来的,而是一种“格式塔式”转换,并且在相邻的两种知识型之间不具有可通约性,它类似于库恩的科学“范型”。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还专门提出陈述的并合性来对抗历史的连续性,强调歧路、岔口,认为当我们试图沿着那个线性连续的路径追溯历史的起源时,我们所遇到的是一张地形图一样的网络,根本不可能理清一条没有分岔的线路来,或者说无论从哪儿开始都是合法的。历史与其归结于某个起源不如看作是不同的支叉并合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福柯的历史哲学看作为地形学历史。他强调用转换的游戏替代连续的、发展的分析。强调转换就是强调思想史的断裂性以及不可通约性。历史就像积木那样,不断地被组建起来又被拆散的图形,各种图形之间虽然可能存在着相同成分,但不同图形之间却不存在累积性、连续性、演变性和可通约性。

同时,历史连续性和主体是相互支援的。一方面,主体地位需要历史连续性来保证;另一方面,历史连续性也只有在这个先验的主体面前才能成立,“使历史成为连续性的话语和把主体作为人的意识作为历史发展及一切行动来源是同一思想体系这个硬币的不同的两面而已”。历史主体的死亡就表明了作为历史参照点的那个统一的、融贯的主体是不存在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p. 64.

参见,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p. 244 ~ 255.

参见 R Flynn, “The philosopher-historian as cartographer: Mapping history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Pittsburgh 1999, Vol. 29.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p. 12.

的,所以连线性的、连续的历史都成问题,不用说历史的累积性发展。

历史进步论是一种先验的目的论,它预设着一个人们持之以恒地向之运动的事先给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是在线性的编年史时间中展开,因此编年史时间是对经验作形式化处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种背景或一套先验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样的功能,一方面,仅仅由于时间的先后就有了新与旧、创新与模仿的区别和不同价值等级的区别;另一方面无论是怎样矛盾、不相容、断裂、模糊、不可约的现象,一旦被纳入这套框架中被重新组合和装配后,历史就变成了理想的、连续的,从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变成人类的命运或目的,并且运用一些先验的话语单位维护这种目的,“如像发展和演进的概念:它们可以把一系列分散的事件重新组合起来”。

福柯的谱系学和考古学方法中断了思想史的先验的目的论的连续过程,抛弃了乐观主义的历史发展论。它认为,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一天天变得进步起来,实际上,“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相关,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都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由低向高的进步。

五、拒绝历史总体化

众所周知,理性是一种逻辑连贯性、一致性和同一性。在同一陈述、命题、句子或话语单位中不允许既肯定A,同时又否定A。所以,矛盾是传统历史竭力要排斥、消除的因素,相反,连贯性、一致性和同一性既是它们理论预设、分析的结果,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追求一致性必然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总体化过程,因为理性同一性就是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制性的力量,一切话语都被整合成为它的力量,即历史的元叙述的原则,一切历史文本都被归于某一个共同意义或主题之中,并且它们作为历史研究中取舍真假、有无意义的标准。

在现代历史哲学框架中,编年史之所以能把历史话语理解成总体的、同一性的话语主要建立在存在着同一话语对象、陈述形式的连贯、概念的一致性和同一主题等相互联系的4个基本预设基础上。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逐一拆毁这些假定,从而从同一性历史的恐怖中解救出来。

第一,同一话语单位形成是由于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或者说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如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它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是由于存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4页。

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53页。

在着这样一些陈述群,它们都可以被归结为在不同方式在某个体的或社会经验中显现出来的叫“精神病”的对象。这些陈述群围绕这个同一对象建立起来的整体,就构成了精神病话语单位。但是,这个被叫做精神病的对象本身并不是同质的存在。很明显,同样是精神病,在“17或18世纪医学陈述作为它们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对象与出现在法庭判决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同样,精神病理学话语的所有对象从皮耐尔或是到埃斯齐罗尔到布勒雷都已更改了:此处和彼处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种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样的”。对象本身是在多样性、异质性不断转换空间中形成的。对对象形成考察实质就是对规定不同对象转换形成规则的确定。话语对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而是存在话语关系的复杂的网络之中。

第二,陈述形式的连贯。编年史方法认为陈述形式的连贯性可以确保话语单位的有效性。陈述形式有多种多样,不同的陈述类型起着分割不同话语单位的作用。如语法学与精神病学话语之所以能够作为独立的话语单位存在就是由于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陈述类型。

首先作为主体的承担者的个体是如何确定的?如在医学话语中,医生无疑是话语的主体。这个主体位置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替换进入这个位置的。“医嘱不能出自随便什么人之口”。主体位置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社会建制确定的。还是以医生为例,医生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系统、教育规范,确保知识实践和试验的合法条件;包含与其他一些个体或群体的区分和关系的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特征。这些社会建制本身是历史的、处在不断游戏变换中。

其次,话语发挥陈述功能还需要话语“场所”。如医生需要医院、化验室、图书馆等,这些“场所”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增加了其重要性,有的则降低了其重要性并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话语融为一体。

最后,主体的位置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还是以医生为例,他在临床话语中,依次成为提问的主体、听的主体、观察的主体、感知的主体(利用医疗工具为中介)、记录的主体和教育的主体。每一种主体身份陈述的类型都是各不相同,有描述、归纳、概率、推理、因果性等陈述方式,所以,“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这样传统编年史把话语单位寄托在某种陈述类型统一的期望也落空了。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连贯的陈述类型作为话语单位的标准或规范,只有“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的并存;支配它们分布的体系,它们相互依靠的支点,它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承受的转换,它们的换位,安排和替代游戏。”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39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63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67—68页。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42页。

第三,概念的一致性。编年史方法的另一个前提就是由于存在着持久的、一致性概念,因此,围绕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陈述群构成了同一个话语单位。在考古学看来,支配概念出现和循环、分解、重组、替代、位移的是陈述的总体布局。在陈述群构成的网络中概念才得以形成,如一些旧的概念消失、新概念出现、从旧概念中派生的,但与原来概念是不相容的、旧概念的循环等异质性成分。概念形成一方面是一个充满错觉、偏见、谬误、想象、隐喻化过程;另一方面那种恒久、一致性的概念系统并不存在。

第四,同一主题。编年史还认为话语单位整体性还可以通过统一、连续、稳定的主题加以保证。如经济学、精神病学、生物学、语法等话语单位的存在是由于它们各自拥有的主题形成的分割。表面看来似乎是合情理的,但是只要进一步分析,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主题没有这样的连接能力;另一方面也没有统一的主题。因为主题是一些话语策略选择的结果,这种策略的选择还要满足非话语实践要求。如普通语法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财产分析在政府的政治、经济决策及日常实践中的作用等等。总之,在所谓主题的持久性问题上,考古学所“发现的却是各种各样策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使那些不相容的主题活跃起来,或者还可以便同一主题投入到不同的整体中去”。

既然话语对象,陈述形式。概念和主题都不存在一致性,那么,整体性、特许的历史元述本身就是启蒙运动制造出来的神话。它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工程,是一种理念的世界的专制。它盗用历史的同一性、普遍性、整体性名义,以同质化方式排除异己,无端地牺牲局部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来行极权之实。为了摈弃现代主义的元叙述,恢复被埋葬和伪装在完善统一的系统之下的历史内容,必须用散乱的历史或谱系取代总体化历史,用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这就是给予局部的、个人的、特定团体的和地区性的话语特别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地区和人给予充分的关注。很明显,福柯坚决拒绝总体化历史,是为了“反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

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那么,谱系学则是拆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每个人从原来讲坛中拿到了一块砖,每个人都站在同样的高度,并拥有相同的说话权利。

(作者余章宝,厦门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陈启能)

(责任校对:刘 军)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46页。

Benjamin S. Pryor, "Counter-remembering the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Today*, Celina, 1998, Volume 42, p. 147.